

为开好党的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1955年底至1956年春，党中央安排进行大规模系统调查研究。1956年2月14日至4月2日，毛泽东分别听取中央工业、农业、运输、商业、财政等35个部门工作汇报。在认真听取汇报和深入思考基础上，毛泽东于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经政治局同意后，又于5月2日向最高国务会议作报告。《论十大关系》前五条分别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后五条分别讲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论十大关系》系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明确提出了“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初步确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若干重要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建立在实践中、在经验中的深刻认识，对当时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论十大关系》彰显了我们党独立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很快地摆在全党面前，对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且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开始阶段主要是向苏联学习，经过执行“一五”计划三年多的实践，对苏联模式逐步有所了解，认识到其做法并不都是正确的，即便是正确的做法也不一定都适合中国。所以，毛泽东在文章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在阐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又特别强调，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我们



□ 王一彪

“运用普遍联系观点 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

——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充分表明，从这个时候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大问题上开始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为后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论十大关系》彰显了我们党关心群众生活的人民情怀

文章把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放在第一章进行阐述，鲜明指出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带来影响人民生活的后果，强调“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在阐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提出“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工资“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毛泽东批评

苏联的做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导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文章生动而形象地指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来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朴素通俗的话语蕴涵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体现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论十大关系》彰显了我们党敢于正视矛盾、勇于解决问题的改革理念

《论十大关系》本身就是奔着问题来，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问题，通篇贯穿着鲜明的问题导向。针对当时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强调“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针对“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的问题，强调“这要改变一下”；针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关系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强调“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针对如何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强调“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

克服缺点”；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的问题，强调“要好好研究一下”。文章最后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坚信“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后来我们党正是通过改革不断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科学构想。

《论十大关系》彰显了我们党坚持向外国学习的开放胸怀

在阐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毛泽东一开始就讲道，“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他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特别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

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针对当时“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的现象，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从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到新时代推进全方位开放，与这些重要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论十大关系》彰显了我们党系统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方法和治国方略

十大关系就是十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前五条侧重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后五条重点讨论政治、文化建设问题。这充分体现了系统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充分表明政治以经济为基础，同时政治建设又保障和推动经济发展。在处理这些具体矛盾和问题上，始终秉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

点，强调矛盾双方既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系上，强调发展平衡、比例协调；在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利益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强调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强调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共同致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待反革命分子，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待党内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待外国经验，坚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处理好这一系列重大关系，最终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力作，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邓小平曾就《论十大关系》整理稿致信毛泽东时说：“我们在谈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正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我们要运用好《论十大关系》等重要历史文献中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经验智慧，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这里就是中国的未来”

——读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

□ 蔡嘉生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是国际知名记者和作家，191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两年后随父母移居中国。抗战时期，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对中国战场进行深入采访和报道，其间加入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宣传抗日斗争并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1944年，他突破国民党的封锁，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写下大量的新闻报道和家书，得出“这里就是中国的未来”的深刻结论。199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爱泼斯坦专门将其当年发往《纽约时报》的25篇通讯和写给妻子的14封家书结集成书，为后人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活动提供了许多鲜活材料。该书篇幅并不长，只有10余万字，但它从外国记者的视角看中国抗战与革命，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道路的艰辛不易与光明前景。正如作者是在序中所言，“这本书有助于读者懂得是什么精神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路军在打仗，打得很艰苦而且打得很成功”。抗战后期，国民党一直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竭尽污蔑，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中外各界难以同延安建立联系，更无法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1944年6月，在各方力量的努力运作下，“这本外西北参观团”共21人突破封锁访问延安。参观团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并在这里进行了深入考察。

爱泼斯坦曾在延安地区进行过长时间的采访参观，因此或多或少受到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影响。到了延安之后，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有了全新认识。在考察了八路军晋绥军区军需处

后，爱泼斯坦写下了《为解放提供供养》这篇通讯。其中提到，“这里的武器仓库里有许多日本武器，比我见到傲然展览在中国其他地区战利品陈列室里的还要多，其中有大炮、机关枪、步枪、弹药、催泪弹和糜烂毒气弹的圆筒……”显然，八路军的军需物资主要来自战场缴获，这让国民党鼓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不攻自灭。作者感慨道：“与国民党硬说八路军未和日军作战这种造谣中伤相反，八路军在打仗，打得很艰苦而且打得很成功。”同时，他们还目睹了八路军对敌人的两次袭击，成功摧毁敌军碉堡数十座，从而对“共产党的军队和当地居民在华北进行的人民战争的性质、深度和各种形式都获得具体的了解”。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团还亲眼见识到八路军的英勇作战。爱泼斯坦在途中遇到一位美国战斗机飞行员约瑟夫·巴格里奥，他的飞机被日军击落，但又幸运地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发现并救起，正护送前往陕甘宁边区。实际上，同时期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共营救了10多名美军飞行员，史迪威将军为此还专门写信向朱德表示感谢。

“中国共产党及其当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全面的阶层”。在爱泼斯坦眼中，延安军民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与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的重庆国民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犹如“两个世界、两种心境”。特别是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干部接触之后，他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当前的支持者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最广泛全面的阶层。”

最爱爱泼斯坦印象深刻的是毛泽东独特的领袖魅力。正如书中所言：“融合在毛身上的既有深沉的严肃，又有地道的幽默感，既有耐心，又有决心；既有思想，又有行动；既有自信的一面，又有谦恭的一面。”毛泽东是可以接近的，并且很简朴，他会在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不带警卫，拍照不站在中间……寥寥数语，毛泽东的亲民形象便跃然纸上。爱泼斯坦在《采访毛泽

东》这篇通讯中还将其与蒋介石作了深入对比。他说：“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烦琐事物，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而毛泽东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爱泼斯坦所言不虚，国共两大领导人迥异的领导方式，似乎也预示了这两个政党在战后的不同命运。

爱泼斯坦还与朱德、邓发、聂荣臻和王震等有过密切接触。他由此了解到共产党员来自各行各业，有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军人，不仅代表广泛，而且觉悟很高。比如，他提到聂荣臻所在的八路军115师有个旅长原来是大地主，在家乡第一个举起抗日旗帜，后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八路军。爱泼斯坦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代表阶层的广泛性主要在于其抗日纲领的正确性。他在边区遇到了许多非共产党人士，有“中国各大学的前教授和毕业生、在战前并无左翼历史背景的学者、作家等”。

“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广大军民进行持久抗战，而且在各根据地广泛建立民主政权，施行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大政方针。1944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号召中国人民“给予在中国境内作战的盟军一切援助，以便在和平、民主、繁荣的新世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爱泼斯坦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所作的诸多努力。

部队劳作、军民平等和团结友爱

的边区生活给爱泼斯坦留下“强烈的第一印象”。他在《对人民中国雏形的最初印象》这篇通讯中谈道：“曾经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王震旅长身上那身旧军服和脚上那双草鞋，比他的许多士兵都不如……”书中还提到，参观团受邀列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常委会的联席会议，目

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运作机制。他后来总结道：“陕北就是一个实验区，说明甚至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而且是在处于遭到封锁的状况下，也可以军民联合起来，在战时既能全面增加生产又能加强战争。”在他看来，“这里产生了一种别处见不到的全新的中国人——正直、不怕当权者、随时准备接受批评和新思想……”他认为，干部艰苦朴素、民众积极参政、政府为民办事，这是新式“人民民主”的具体表现。

在敌后战场，外国记者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军民这股强劲的抗日力量，无不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

的钦佩之情。这一点在爱泼斯坦写给其妻子的信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信中坦言：“这个边区遭到包围封锁，但并不是一个可怜的地区，而是一个小型的国家，是许多地区的后方，把这些地区都加在一起，那就大了许多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边区人民始终坚信，这里就是中国的未来”。在这里，他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出现”。

总之，书中再现了1944年中外记者突破封锁访问延安的诸多细节。无论是爱泼斯坦，还是其他国际友人，他们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由衷地表现出强烈好感！

尽管国民党处心积虑安排种种限制，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却是一次突破，对世界舆论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领导力和顽强战斗力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但随着一篇又一篇的通讯发往各地，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形象已大为改观，中外各界逐渐认识到，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而战后必将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对于爱泼斯坦来说，这次非同寻常的考察经历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在以后的工作中由同情转向支持、由支持转为信仰，始终与中国人民战斗在一起，爱泼斯坦在1957年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就了中外交往史的一段佳话。

用典释义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讲话原文】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得到了14亿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我们要认真回顾走过的路，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继续走好前行的路，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植根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只要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在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10日）

【出处】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浪水。
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唐）李白《上李邕》

【解读】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出自李白的七律《上李邕》，意思是大鹏总有一天会乘风起飞，凭借风力直上九天云外。该诗作于开元十四年，李白时年26岁，诗句表达了青年李白的凌云壮志。

大鹏是《庄子·逍遥游》中描绘的神鸟，传说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大鹏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是自由的象征，李白深受其影响，常以大鹏自比。开元十三年，李白出蜀漫游，在江陵遇见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赞其“有仙风道骨焉，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当即作《大鹏遇希有鸟赋》，自比为志向高远的大鹏鸟。直至去世前，李白还在《临路歌》中咏叹“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至今，现代汉语中还有“鹏程万里”“鲲鹏展翅”等成语，借以比喻远大的前程和抱负。

“带雪絮归来，满庭春意。事业方新，大鹏九万里。”在农历辛丑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用“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动员并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征程上再接再厉，奋勇前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鲲鹏之志。“会当水击三千里”，只要我们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继续保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一种警醒，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杨立新）